

财政史研究

(第九辑)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编



- 早期国家的财政文明——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启示 李炜光
用思路把文献与文物串起来——以先秦公车制度史为例 叶青
从漏泽园砖铭看安济坊的社会保障对象 付志宇
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作坊及匠人待遇 陈锋
晚清发票实物辨析 高献洲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政史研究

(第九辑)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 编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政史研究·第九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编.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1

ISBN 978 - 7 - 5095 - 7135 - 4

I. ①财… II. ①中… III. ①财政史 - 研究 - 中国 IV. ①F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0474 号

责任编辑：洪 钢

责任校对：李 丽

封面设计：陈 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 @ 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84041336

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4.75 印张 356 000 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50.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7135 - 4/F · 5722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 - 88190492，QQ：634579818

《财政史研究》编委会

顾 问：李俊生 孙翊刚 李炜光

编委会主任：马海涛

编委会成员：李 燕 王文素 马金华
张劲涛 李 佳

主 编：王文素

前　　言

中国财政历史，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在为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奋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财政思想和精深的安邦智慧，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明宝藏。

财政虽然属于经济范畴，但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创造的劳动成果日趋丰富，私人占有财产形成一定规模，凌驾于普通百姓群体之上的权力集团随之出现，所需公共事务开支就必然对私人经济部门的产品进行再分配——早期的财政产生了！我国舜禹时期，正是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年代。当黄河、淮河流域的水患基本治理平复，两岸居民有了安居和生产的条件后，大禹划地居民，在组织生产、生活的同时，通过对版图内自然环境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居民赋税贡纳制度（见《尚书·禹贡》）。规定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纳赋（土地税）、进贡（山林出产税）的义务，根据地质、地势和产出品种确定不同的税率及贡物，体现了区别对待、公平负担的财政原则。所以司马迁肯定地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见《史记·夏本纪》）。进入西周时期，相传周公制定了集夏、商以来国家机构设置（包括财政经济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职权的制度大全《周礼》；西汉中，司马迁作《平准书》、《货殖列传》专篇，前者为西汉前期的财税制度，后者为秦汉时期的经济地理。自此，各朝代国史均设《食货志》为财经专章，沿袭至清朝。

中国立国数千年，“以史为鉴”始终是各代政治家、思想家治国平天下，史学工作者治史的金科玉律。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说：“历史果何等学问？治之果有何用耶？自浅者言之，则曰：史也者，前车之鉴也。”“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者也。”“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司马迁所著《史记》，人称“事曩词简，是称实录”。财政史的研究，亦是对财政思想、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的记述及科学总结。我们不仅要运用现代财政学理论对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各种财政现象作定量和定性的分析、研究，从中提炼出财政制度变迁史研究的理论框架，还要进而揭示财政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现代财政学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为未来国家财政政策、制度的设计提供发展趋势的建议。

我们确定的财政史研究范围是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财政史实；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财政思想；研究内容是以中国财政制度和财政思想为核心，并将关系密切的货币金融、会计、审计、贸易等部门经济史融合一体，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国财政体系；重点研究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中居支配地位或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对中国财政制度和理财思想的形成、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从中西方的社会性质、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文化、宗教、地理环境的差异中，探寻中国财

政制度、财政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在世界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财政史展示的是一个宏大而久远的课题，为了把对她的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对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央财经大学各届相关领导和教师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我校曾经编著并公开出版了第一部《中国财政史》教材，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财政史助教进修班，成立了中国财政史研究所，并创建了第一个“中国财政史”研究网站，承办了第一届全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年会，举办了第一届财政史教学国际研讨会。我们一直在努力奋斗，力争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史学科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特色鲜明的成熟学科，成为实质性的全国财政史教学科研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在向前发展，新的事物不断涌现，财税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迎接新的使命和挑战。为此，在中央财经大学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创办《财政史研究》刊物，以期为全国广大财政工作者，理论研究者、教授、专家提供一个探究财政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实的平台。为此，我们希望各位专家、教授和广大读者热心参与、勤奋耕耘、精心呵护、精诚合作，共创财政历史研究的繁荣局面！

目 录

“在财政历史研究中文物与文献互证作用”研讨会综述	王文素 龚 浩	(1)
财政与政治经济		
早期国家的财政文明		
——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启示	李炜光	(11)
用思路把文献与文物串起来		
——以先秦公车制度史为例	叶 青	(23)
从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看北魏早期二元财政体系	史 卫	(31)
收入与管理改革		
西周“彻法”门外谈	刘战兵 洪 钢	(39)
税收与王朝兴替	李胜良	(46)
“摊丁入亩”对当前我国财税改革的启示	李顺明 李济南	(57)
崔敬伯与民国时期的遗产税立法	李玉兰 任晓兰 董永泉	(66)
支出范围与方向		
从漏泽园砖铭看安济坊的社会保障对象	付志宇	(81)
唐代中后期藩镇长吏主持下的保障民生工作	李志刚	(89)
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作坊及匠人待遇	陈 锋	(100)
思想人物与文化		
中国古代理财中的义利观及其对当代理财的启示	齐海鹏 李 娟	(113)
论商鞅的理财思想与措施	谭建立	(135)
秦皇汉武 千秋功罪		
——聆听历史的警示	刘孝诚	(156)
晚清发票实物辨析	高献洲	(163)
票据中的冀商发展轨迹	毕志夫 程 浩	(180)
解读苏州码：一种行将消失的珍贵文化遗产	曹 琳 毕志夫 古建芹	(187)

财政史教学改革

- 财政学跨学科发展变迁研究 李 贞 陈吉兰 (199)
建立世界财政史学科，开设《世界财政史》课程
——兼论欧洲“新财政史”学 马金华 (209)

借鉴参考与对比

- 大陆学派的国家财政职能观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李 佳 江孟楠 (217)

“在财政历史研究中文物与文献互证作用”研讨会综述

王文素 龚 浩

2016年6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中国财政史研究所承办的“2016年中国财政史学术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召开。来自武汉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部科研院、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中国税务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家博物馆、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国发票博物馆等数十所高校、科研院所、媒体和博物馆等单位的六十几位学者出席本次研讨会。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马海涛教授和中国财政史研究所所长王文素教授主持会议。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教授为大会致辞。是会以“在财政历史研究中文物与文献的互证作用”为题，讨论了我国财政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如何在财政史研究中运用文物与文献互证的方法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对如何在多学科视野下深化财政史研究交换了观点与意见。兹将大会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文物与文献互证”在财政史研究中的意义及研究案例

目前我国财政史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对我国古代文献的爬梳与整理，研究所使用史料的主要来源为历朝历代的正史、政书。近年来，学界对财政史研究的史料来源进行了大范围拓宽，将文物、简牍、档案、碑刻等纳入了财政史的研究之中。赵梦涵阐述了本次选题——“在财政历史研究中文物与文献互证作用”的意义，文献主要是以文字形式保存的历史记录，文物是指能够反映时代背景、具有保存价值的实物，二者既有差异性也有统一性，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可以指导以及指引文物的发掘与研究工作，而文物又可以反映文献所记载史实的真伪虚实，为文献的研究提供更为切合历史原貌的素材。“文物与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论在史学研究中的有力体现，在文献研究中结合文物资

料可以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生动化、立体化。“文物与文献互证”体现的应该是一种研究思路，即通过实物去验证文献记载的准确性，文物并不能仅仅局限在考古出土的实物或者古代遗址，简帛、档案、碑刻乃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发票在“文物与文献互证”中都应该起到对文献记载的补充与论证作用。

孙翊刚、王文素于会上推出新作《古代财政史论》，该书旨在以“以史带论，论在史中”的方式对我国古代财政史中关于财政的产生、财政收支、财政管理以及财政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讨论与研究。是书突破以往在财政史研究中所采取的断代财政史研究的研究范式，以专题的形式讨论了财政的起源、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化、财政管理制度的变迁及财政思想的嬗变，并探索了财政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作为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书在史料选取中使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以及古代遗留的简牍资料，力求文物与文献的契合，使之更加准确地展示我国古代的财政面貌。

齐吉祥以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为例，阐述了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介绍了陶寺古城、石峁古城等历史遗迹，认为部落时代国家财政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实力，可以支持相当规模的城池建造。

李炜光以三星堆文化遗存为案例分析了早期国家的财政文明，他认为从三星堆古文化遗存的青铜器、祭祀土台、古城墙的遗迹中可以看出三星堆古国财政是一种早期的国家财政，基本特征是财政资源以祭祀活动与军事活动为主要使用方向，同时也要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修河治水等公共基础建设的开支。三星堆古文化遗存表明了财政先于国家产生而存在的观点是可信的，对“国家产生之后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存在而征收赋税”的观点应该重新商榷。

叶青通过对《周礼》中关于公车制度的文献梳理，并结合了在湖北荆州熊家冢楚墓大车马坑发掘的战国马车对我国的公车制度进行了研究。按照《周礼》记载，当时公车的使用：“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驾三，庶人驾一”，而在熊家冢楚墓发掘了三副六驾马车，由此他认为当时周朝的礼仪制度已经开始被破坏，周王朝所建立的礼仪制度开始逐渐瓦解。

付志宇以“漏泽园砖铭”为资料对宋代安济坊的社会保障功能进行了研究。漏泽园、居养院、安济坊是宋代三大社会保障机构，安济坊负责救治疾病，居养院负责对老、弱人等的收养，漏泽园则类似于公共墓地，主要负责安葬逝世于安济坊或者居养院的人员。被葬在漏泽园的人员都有一份记录，记载了其姓名、职业、家庭住址、因何原因进入居养院或者安济坊以及其他信息，他通过解读漏泽园中所发现的砖铭对安济坊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安济坊主要服务于以下四类人群：无依无靠的病人和贫穷无力医治的本地或外地人、军人及其家属、服刑的犯人以及官宦人家的雇工。

作为文献与文物结合体的简牍是财政史研究所倚重的原始资料，朱德贵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为例，对秦代的“訾税”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以“识劫（女冤）案”为例勾勒了秦代征收税的四个步骤：以户为征收对象，户主为“訾税”的承担者；“訾税”以户所拥有财产，如肆、马、稻田、奴婢等为征税范围；“訾税”的征收办法为每年七月由户主以“自占”的形式由官府征缴赋税；官府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对于隐匿报财产的户主的检举与惩罚制度。《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关于“訾税”的记载对学界存在的“秦及汉初不存在财产税”的观点进行了校正。

陈锋以《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为核心资料考察了“清代皇室财政与造办处匠人待遇”，通过对清代内务府档案、清代会典则例、清人文集笔记中相关史料的爬梳，对造办处设置的时间，造办处下属作坊的情况重新进行了考察并得出新的结论。清宫档案既是文献，又是文物，在研究清代财政史的过程中要对清宫档案本身进行深入挖掘。

刘佐展示了一份中央档案馆所藏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通过对政令上署名、签字日期等信息的分析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行政运作程序与财政管理制度做了生动地剖析。

史卫通过对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的解读认为北魏早期财政体系为二元财政体系。根据20世纪90年代被发现的北魏文成帝《南巡碑》记载，北魏前期职官存在内外双设的现象，在财政职官中，外官尚书系统担当财政管理的行政责任，而内侍系统的财务官员担当财政管理的监察责任。

高献洲以自己所收藏的191件晚清时期发票为研究样本（这批发票以嘉庆六年济新堂为最早），通过对发票的产生、发展的研究，以及对发票上的文字、符号、数字及其他记载内容的解读、剖析，认为早期的发票产生于民间的商业活动，它只是一种自由的、自发的、纯粹的民间商用文书，从制作方式与使用规则而言，发票的使用都还有明显的自发、自由、任意、局部或区域的特征。

曹琳对民国时期发票中所使用的苏州码进行了研究，苏州码是明中期以后流行于我国民间的一套计数方式。她展示了1940年“南海洋行”开具给“同记商场”的发票、张家口“宝庆源”开具给“双兴号”的传统书契式发票、1940年“天泰兴记”发票等为研究对象，对发票中所使用的苏州码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分析，认为苏州码因为其简单形象、书写便利、易学易记的特点成为了我国传统社会时期市民生活中的最主要的计数方式。

毕志夫以票据为素材对冀商的公司营业模式进行了研究，从作为冀商典范——同纪公司的发票可以看出，同纪公司率先实行了货币两清的即时结账方法，这种发票有采买人、收发人、部门负责人、主任确认后转入财务，并且根据商品类别直接进入柜台销售，减少了公司的仓储费用，加快了财务资金的流转速度，提高了公司的办事效率，推动了公司的发展。

李胜良以民国时期发行的报纸为核心资料对1924年广东大元帅府发生的税收征纳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详细地爬梳了《申报》、《晨报》、《广州民国日报》、《香港华字日报》、《南铎日报》等民国期刊报纸中关于此次危机的记载，还原了危机发生的背景、过程以及结果，并认为广东革命政府明确了税收征收关系，形成了强有力的统一财政，为广东革命政府取得了对北洋以及地方军阀的财政优势，推动了广东革命政府向全国进军并实现统一的历史进程。

二、多学科视野下的财政史研究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财政学一直作为应用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存在，李俊生认为这种学科设置的方法和财政学科的内涵与性质不符，财政学有着自己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李贞、陈吉兰爬梳了在财政学发展进程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派别的历史演变：其一是起源于英美国家的盎格鲁—萨克森学派，他们主张财政是政府干预经济使之科学，政府

并不构成市场的主体；其二是产生于欧洲大陆的大陆学派财政理论，他们认为政府是市场的一部分，政府参与市场并与社会中其他主体的目标一致。他们认为在财政学理论的历史演变中，财政学与政治、经济、税收、法律以及社会公共管理等学科密切结合，只有统一综合性的财政理论才能拓宽以及推动财政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财政史作为财政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其不仅与财政学所涉及的各个学科有密切关系，而且还与历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此马金华认为：财政史的研究应该整合历史学界和财政学界两大资源，打破思维的藩篱，财政学出身者，长于演绎和理论分析，论著理论性强，难免空泛；历史学出身者，长于归纳和实证分析，论著资料详实，却又有失通俗，将两种研究方法范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创新当前的财政史研究，推动财政史研究的发展。陈锋提出：财政史虽然研究的是财政问题，但是基础是历史学，只有在充分了解历史，准确把握史料，恰当剖析史料之间的勾连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财政史所涉及问题的准确分析。李俊生提出在财政史的研究中应该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为定量研究提供必要的视野与方向，定量研究补充与修正定性研究的成果。李炜光将土地制度、小农经济、财政制度三者结合起来阐述了财政社会学的观点，认为财政并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和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财政并不归属于某一系统，而是在其中起到了连接作用，只有财政运转正常了，这三个子系统才能更好地运转；他提出财政学的研究要摆脱依靠经济学所使用的技术工具研究的窠臼，逐渐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

李俊生和马金华分别介绍了新财政史研究的观点，新财政史是 20 世纪末，由鲍尼与奥尔默德所提出的从财政变迁解读历史的研究方法，它是从传统财政研究中逐渐独立出现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在传统的财政研究中，财政的变迁仅仅被看作为宪法和现代化研究的附属品，新财政史将欧洲的历史看作是从贡赋型国家经过领地国家和赋税国家向财政国家的转变过程，新财政史以财政体系为研究对象，在财政体系的历史脉络中找到了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为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同时新财政史研究的观点也是将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相结合起来对财政体系的演变进程进行研究与思考。

在研究我国财政史时，与外国财政史进行比较是一种必要的方法，但是由于语言、资料等问题，使得国内对外国财政史的研究相对不足。近年来一批有志于世界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著作，如施诚《中世纪英国财政史研究》、史卫《人类财政文明的起源与演进》、于进《坚守与改革——英国财政史专题研究》、徐红《财政掌控与财政民主——英美议会财政权的政治学分析》、张荣苏《“财政革命”与英国政治发展研究（1660—1763）》，但是关于外国财政史的研究较多的集中在对英国、美国的研究，对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涉及不多，对于世界上一些地区财政史的研究则是空白。马金华认为：我国财政史研究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学习与吸收国外财政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通过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的财税历史进程，从而加深对当今各国不同财税体制的理解，了解主要国家财政体制演变进程。国外财政史的研究急需翻译大量的外文史籍、著作，从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财政史开始，一直到当下世界上主要国家，如英、法、美、德、俄、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拉美、非洲、亚洲其他地区国家的财政史研究著作，为我国学者研究外国财政史提供必要的帮助。同时，在国内高校开设世界财政史的课程，培养我国专门研究外国财政史的人才，提高我国学者研究世界财政史的水平，为我国的财政史

研究提供比较对象以及借鉴经验。

三、他山之石——从经济史研究发展看未来财政史研究的突破点

谈到财政史研究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与之相类似学科的发展经验，如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吴承明认为经济史是19世纪晚期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①。赵德馨认为经济学诞生之初，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二者是统一的，19世纪中叶，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学发展成为了两门独立的学科^②。就我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学派：其一是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他们注重对经济制度的考察与研究，偏重于对于史料的爬梳与整理；其二是以经济理论作为指导去研究经济的发展，他们以娴熟的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基础，利用史料中可用的数据构建数理模型对经济变迁进行研究；其三是在经济史研究的过程中侧重对社会变迁的分析，尤擅长于田野调查与分析，这一派又被称为社会经济史派^③。经济史研究中学派林立，见解纷呈，成果丰硕，反观财政史的研究则相对而言囿于一隅，目前财政史的研究主要以历史的研究方法为主，即以爬梳文献、钩沉史料的方式对财政史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也较为单一。经济史研究能够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史研究中方法论的多样化，19世纪初期，经济学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使得原来历史学中关于经济史的内容可以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与解释，于是经济史成为了独立的一门学科。当时经济史虽然成为了独立的学科，但是受到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响，使得经济史依旧属于历史学领域，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历史学的方式对文献进行考证。20世纪初，随着实证主义受到质疑，经济史的研究也发生变化，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整体观史学、以福格尔为代表的计量史学以及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于是计量分析与制度分析等作为重要的方法被引入了经济史的研究，前者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史进行研究，后者则以制度分析为主要内容，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经济史进行研究^④。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丰富，经济史研究的所能采用的方法亦越来越丰富，吴承明曾就经济史研究所采取的若干种方法论进行过讨论，并深刻地剖析了其利弊得失，他认为研究经济史需要以史料学与考据学为基础，“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则是道出根本”，在具体研究中则可以采用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系统论等诸多方法来对经济史进行研究^⑤。

相对于经济史所采取的方法论而言，目前在我国财政史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论则比较简单，即以历史学的方式与方法对文献进行考证、爬梳，尤其是以正史、政书为主要的史料来源。本次财政史讨论会以“在财政历史研究中文物与文献互证作用”为题，将文物与考古成果对财政史研究的作用纳入其中，孙翊刚、王文素、齐吉祥、李炜光、付志宇围绕考古所发现的文物或者古代遗址对若干财政史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以进一步拓宽了史料的范围，

① 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赵德馨、李洪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当代经济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经济学情报》1995年第2期。

③ 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④ 赵凌云：“‘新经济史革命’的路径、内容与借鉴”，《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⑤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简牍、档案、碑刻、发票、报纸都被引入财政史的研究，朱德贵通过整理秦简、陈锋通过爬梳清代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分别就秦朝与清朝的财政问题进行了研究。史卫解读了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对北魏的财政体制进行了研究。高献洲、曹琳、毕志夫以晚清以来的发票为素材对近代以来我国若干财经问题进行了分析，李胜良以民国时期的报纸为核心资料对广东革命政府的财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可以说本次研讨会实现了在史料选取上对以往侧重于正史、政书的史料来源的突破，在既定的历史研究方法上拓宽史料选取的范围更有助于推进财政史研究的发展。

在拓宽财政史研究中史料来源范围的同时，对财政史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应该是当下财政史研究的重点与突破方向。经济史研究在发展中引入了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方法，财政史的研究也应该广泛借鉴财政学本身的理论基础，同时可以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本次研讨会首先就财政学与经济学的划分进行了讨论，财政学不是经济学，它拥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以及方法论，财政史的研究则应该结合财政学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财政学理论的创新是财政史研究取得新发展的必要条件。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就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成果。李炜光、任晓兰所提的财政社会学的观点，将财政问题和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政治体系从经济体系取得财政资源，以维护社会秩序，转而要为经济体系服务，保护产权和交易行为，以换取经济系统为期永久性提供资源；同时，政府要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以获得社会成员对它的支持。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赞同和支持，政府就无合法性可言，共同体的关系也就难以维持既久。”^① 财政社会学通过对税收和预算制度的研究探求现代化国家的构建与发展。勒继东、边明社、徐红等人提出财政政治学的观点^②，财政政治学“以新经济史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和预算政治分析为主要分析框架，以国家财政活动的制度框架和政治过程为着眼点和切入点，主要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政治过程和财政民主法治等实践和理论问题。”^③ 结合这些财政学理论的发展，财政史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刘守刚结合财政社会学的理论对历史上的财政类型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认为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是财政从家财型向税收型转型的过程^④，尤其是对我国历史上家财型财政体制进行了深入研究^⑤。徐红利用财政政治学的理论对西方国家议会财政体制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⑥

同时一些经济学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引入财政史的研究，梁若冰结合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对清末新政时期的新政与革命选择进行分析，同时利用历史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考察了清末新政时期财政压力对民变的影响并讨论了清末改革失败的原因^⑦。魏柱灯、方修

^① 李炜光、任晓兰：“财政社会学源流与我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财政研究》2013年第7期。

^② 边明社：“公共选择理论与财政政治学的形成与兴起”，《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徐红：“从马克思的财政理论到西方财政政治学的兴起——议会财政权理论的历史性梳理”，《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8期。

^③ 勒继东：“财政政治学的缘起、发展和问题”，《中国管理信息化》2015年第8期。

^④ 刘守刚：“财政类型与现代国家构建——一项基于文献的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⑤ 刘守刚：《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刘守刚：“家财型财政的概念及其运用”，《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1期。刘守刚、刘雪梅：“从家财型财政到公财型财政——中国财政转型的案例分析”，《山东经济》2009年第4期。

^⑥ 徐红：《财政掌控与财政民主——英美议会财政权的政治学分析》，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⑦ 梁若冰：“清末新政、财政崩溃与辛亥革命”，《世界经济》2015年第6期。

琦、苏筠搜集整理了我国古代关于气候变迁的记载，继而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财政平衡的影响，认为财政平衡与降水变化成正相关，财政平衡的变化趋势受到了气温与降水的显著影响^①。新的理论发展与新的研究方法极大地丰富了财政史的研究，但是较之于经济史研究所取得成果而言，我们所取得成果还是比较少，因此有必要在财政史研究的方法论上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并将其与财政史研究本身相结合，推动财政史研究的发展。

四、结语

财政史研究的发展要以史料的拓展整理为基础、以研究方法的创新为突破点。本次论坛以“在财政历史研究中文物与文献互证作用”为题主要讨论了财政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与会学者从方法论本身的意义以及研究案例等多个方面围绕本论题提交了相关论文并展开了深入讨论，又探讨了如何实现多学科视野下的财政史研究，就如何将财政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展开了讨论，介绍了新财政史观点，提出了发展世界财政史研究的论题。论坛为财政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指导以及研究范式，同时又为实现财政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与研究视角。会议汇聚了财政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促进了老一辈学者和年轻学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有助于财政史研究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① 魏柱灯、方修琦、苏筠：“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财政平衡的影响”，《地理科学》2015年第9期。

财政与政治经济